

张宇宏 樊希安 著 / 长春出版社

公木评传

臧克家 题



公木评传

张宇宏

樊希安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公木评传

张宇宏 樊希安 著

责任编辑：许 仲 董辅文

封面设计：王国庆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长春出版社发行
吉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0年4月第1版

印张：10 插页：6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5 000

印数：1—3 000册

ISBN 7—80573—203—5/I·33

定价：4.50元



公木 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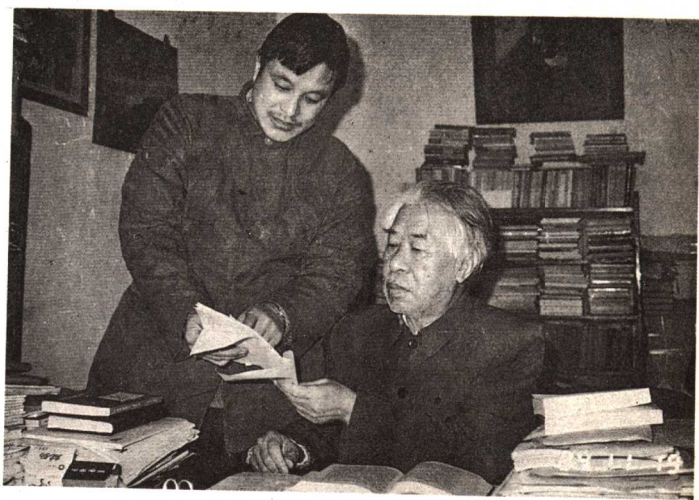
1949年公木和吴伯箫、穆木天（前排中、左）、蒋锡金、杨公骥、张毕来（后排右、中、左）在长春合影



公木和夫人吴翔合影（1986年）



在日本访问（和冰心及冰心女儿合影·1980年）



公木和李军在探讨中国诗论（1984年）



公木 和作者之一樊希安在一起（1990年1月）



公木 全家三代人合影

代 序

公木，我尊敬的诗兄

朱子奇

各位同志，公木同志——我的老战友、老诗友，我尊敬的诗兄！

首先，请允许我转达北京的一些同志对公木同志，对会议的祝贺！北京的许多同志知道吉林的同志们要举行公木创作学术活动五十五周年讨论会，又正逢他七十五寿辰，都非常高兴，认为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在电话里，见面时，或在会场上，听说我要来，都恳切地要我转达他们对公木同志的衷心问候和祝贺！有的同志讲了很热情的话，我都记不全、转达不清了。他们对公木的作学问，做人，都表示敬佩，称赞，祝愿他健康、长寿，取得新的成就。这些同志中，有艾青、丁玲、臧克家、舒群、草明、贺敬之、唐达成、李瑛、严辰、柯岩、何洛、陈明、邓友梅、邹荻帆、张

志民、杨子敏、金哲和王谷林、关木琴、陈喜儒等，这里面有的是战友、诗友，有的是晚辈、学生。还有一位是萧三同志的夫人叶华同志，她用俄文在电话中对我激动地讲了许多感谢和祝贺公木同志的话。还有一位是大家没想到的，就是前天晚上，我们几十名中国作家、诗人，欢迎苏联作家代表团时，一位大家熟悉的苏联著名诗人叶甫图申柯。我对他说：“很抱歉，你明早的用语你不能参加了，我早已应邀要到长春去。”他说：“太遗憾了！”我说：“我是去给我的老诗友祝寿，去参加他的创作学术讨论会。”“是谁？”他问。我说：“是公木，著名诗词家、学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啊！中国军歌的词作者，一定请你代我转达对这位老诗人、老战士的问候、祝贺！”我说：“很高兴，一定转达。”他还同我谈了对军歌重要性的认识。苏联作家代表团团长，我们熟悉的苏联国歌词作者之一的老诗人米哈尔科夫，他得过列宁奖金、国家奖金，并荣获了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国歌的谱，原来也是红军军歌。他还记得1949年我和萧三同志在莫斯科与他见过，他说，一生难忘的是，在那次盛会上，斯大林把他介绍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国歌歌词作者，是一位儿童特别欢迎的诗人。毛泽东同志幽默地说，你很象儿童，祝你永远象儿童。逗得大家笑起来。我旁边坐着李瑛同志，他是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我对他说：“在好多国家军歌是要得最高奖的。我们的解放军进行曲起了多大的作用啊！也应得到应有的奖励。”他说：“你的建议好，还有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应一起考虑发奖。”

同志们，我感到很荣幸，能应邀来我国东北、也是全国的文化教育的名城——长春，参加“公木创作学术讨论

会”。今年，是公木同志从事文学、诗歌创作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和他诞辰七十五周年。召开这个会，对研究公木丰富的创作学术成就、贡献、影响，是十分适宜的，同时，对继承、发扬与他的创作学术紧密相关的我国新文学、新诗歌的传统，对繁荣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学、诗歌事业，都很有益处。

公木同志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位老一代的人民诗人、人民学者、人民教育家。他在创作学术上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是我国文学、诗歌财富的一部分，应当给予应有的重视，应当得到认真的研究。从现在开始，同志们认真了。我特向积极筹备和举办这次讨论会的吉林文艺界、特别是吉林大学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讨论会取得成功！

我也是来会上学习的。据说有十几篇专题发言，都作了充分准备。本来，我是抱着很大兴趣，等着听专家、研究者们精采的发言，但遗憾的是，因临时的任务（中国作协要我赶去重庆参加有关郭老的创作学术讨论会）要先走，听不到了，失望了。我只得希望同志们把材料印出来，寄给我一份。我想，北京的不少同志也都很愿意得到的。

亲爱的公木同志，几十年来，你一直是我所尊敬的诗兄。我称你兄，决非客套，也不光指年龄，还指作诗，作学问，指修养、经验等等方面，你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呵！我是作为你的老诗弟，并代表我的老伴陆瑾和一家人来向你祝寿贺喜的！

此刻，我看见你安详地、微笑着坐在我们中间，坐在我身旁，我感到兴奋，欣慰，鼓舞！不由地就会记起1938年在延安那些难忘的热火朝天的岁月来。人老了，记忆就衰退了，昨天的事，今天就可能忘了。但是，同志们，奇怪的

是，老人往往对过去老远的事，反而记得蛮牢的。我们都是1938年夏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于1939年10月，和你同在“抗大”政治部工作，一起生活学习，上山劳动，一起锻炼成长，写诗歌唱。你担任全校的时事政策教育工作，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你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那股劲儿，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热心给学生干部宣传党的时事政策，讲解国际形势。你知识丰富，观点明确，语言生动，常引起听众的欢快笑声。你白天奔跑，晚上在寒冷的窗户都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有时，冷得发抖，就用一条旧毯子披在身上，用嘴哈着气，暖暖手，再写，再写。你与音乐家郑律成合作的《八路军大合唱》，就是这样完成的。我们住的窑洞相连。我们也曾同住过一个窑洞，睡过一条土炕。有时你把我叫起来，亲切地说：“小朱！来唱个歌，唱进行曲，唱军歌！”我喜欢唱，就放声唱起来。窑洞外，大风沙呜呜吹打着，窑洞内阵阵热流滚动着……

这部大合唱，一经唱出后，就受到热烈欢迎，唱遍延安，唱遍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1941年我到延安大学去学俄语，在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我指挥唱《八路军进行曲》。毛主席和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都在场。群众热烈呼喊：“再来一个！再唱一个向前，向前，向前！”“鲁艺”和“部艺”的合唱团正式演唱了《八路军大合唱》，共有六首之多。词曲雄壮优美，充满必胜信心。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这两首，特别打动人，鼓舞士气。还有《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冲锋歌》、《子夜岗兵颂》等，都各有特色。可是，现在都不会唱。建议你们长

春合唱团演出一次完整的。我在延安听过几次全唱的，效果都是成功的。歌词健康通俗，艺术性、战斗性都强，也可单独发表。《八路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实际成了“军歌”。《八路军军歌》保留原名称。一个国家的军歌，其重要性仅次于国歌。这首军歌，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颇为持久的、极为广泛的动员、鼓舞、教育的作用，成了一首我国全军全民喜听乐唱的不朽之歌。一个国家，不朽之歌是不多的。这首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影响。据我所知，在苏联、捷克、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就翻译介绍过。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首好的革命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威力。”公木同志写的“军歌”、“进行曲”，称得上属于这样有威力的歌。千百万战士和亿万人民长久喜爱它，高唱它，唱着它冲锋陷阵，唱着它消灭敌人，唱着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这是人民对作者的最高评价、奖赏，也是一个作者的最高荣誉。

公木同志还创造性地提出“歌诗”的系统理论，并取得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我记得他在延安时就写了一部很长的《新歌诗论》，萧三、周扬、艾思奇等同志都看过，都同意出版。后来又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可惜，延安大变动时，这些草稿失落了。公木同志为发展我国的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歌诗创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歌诗”，我非常赞成提这两个字。什么是歌诗呢？昨天晚上我看了公木同志论歌诗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还可以发挥。要提倡我们古老民族传统的能唱、能配音乐、能上口的这样的诗，这样的歌，这样的词，并加以发展、发挥。有一位年轻的诗词评论者写给我一封信，谈歌诗，里面有一段话值得重视和回味：

“很遗憾的是，公木的歌诗，甚至包括那些极有影响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英雄的赞歌》等诗篇，在有些人的眼里，似乎没有把它们看成是诗，一直排斥在文学史之外，这岂不是一种传统偏见。”

公木同志一直坚持提倡与认真实践他自己提出的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多样化的正确主张，我想起1941至1942年，我们在延安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又愉快地在一起同事。他是我们文艺室的负责人。那时，他就大力宣传和实践诗歌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难得的是，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这样明确主张，这样刻苦实践。座谈会后，更是热情地穿上草鞋，带上草帽，到农民中去生活、工作，收集丰富多采的民歌。很快，发表了著名的《陕北民歌选》，这是一部重要的很有影响的关于民歌的书，诗人何其芳同志写了序，称赞公木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座谈会前，公木的诗创作所走的路子就是正确的。我以为，他的叙事诗《乌枪的故事》、《岢岚谣》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是较高、较统一的。语言朴素、新颖。什么民歌不是诗呵，学习民歌不必要呵，这恐怕是一种偏见，或无知。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大诗人都是重视学习民歌的。甚至，以仿民歌，写出不朽之作的也有不少的。民歌，说的是新旧民歌。当然，仅仅学民歌是不够的，还要学古典诗、现代新诗、外国诗。公木的诗既具有浓厚的民歌风的朴素美和古典诗的音韵美，又有现代诗的色彩和外国诗的技巧。可以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木诗风”。在延安，几次朗诵《乌枪的故事》，我都参加听了，很受听众的欢迎，算得上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杰作。

你别小瞧咱这杆鸟枪，
肉，它可算吃老鼻子啦！
在爷爷手里，
它还是吃飞肉跑肉的；
在爹爹手里，
它打死过披虎皮的走狗；
在我手里啊，
嘿，它已经开过洋荤啦，
它已经吃过东洋鬼子底肉啦！

这首诗，有教育意义，又有诗味儿，写得概括、形象，具有流畅性、明朗美。

在以后的年代里，公木又发表了不少力作。不久前，更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新诗“四化”的理沦，即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首先要以“五四”以来新诗歌为基础，继续前进；坚持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借鉴外国诗歌的先进经验。而“五四”新诗歌便是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又接受了外来的进步影响而产生、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诗歌的繁荣，不是取决于其他什么，而主要是取决于它同人民结合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取决于它能否提出并回答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取决于能否为人民利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取决于它能否被锤炼为创造真善美，剪除假恶丑的锐利武器，它能否被使用作播扬时代精神和理想，亦即伟大共产主义精神与理想的响亮号角。这样，我们的新诗歌就能传达当代亿万人民的真实感情和心声，也就将吸引和激励英勇战士和杰出思想家运用新诗这一艺术武器，来打开人民群众

智慧与创造的源泉，也为世界进步诗坛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公木刚刚出版的《诗论》和《中国诗歌史论》更加详细地、精辟地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这是诗人半个多世纪写诗的结晶、总结，也可以说是对中国进步诗歌运动的一种概论吧。能不能这样说呢？还请同志们注意一下，我上面概括的那些公木的观点，是有一定针对性的。针对着国内外的某些关于诗歌片面的、错误的、甚至荒谬的观点而发的，对我国当前新诗的健康发展，我以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木，我尊敬的诗兄哟！从延安时期起，你就一直热心扶植、耐心引导文学后辈、青年写诗人、评诗人，你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真可谓“不惜变泥土，舍命润花根”的可敬的园丁！在延安就是这样。你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群文学青年、写诗的青年跟着你，围着你，从你那里受益。无论你主编《部队文艺》、筹办《诗刊》、组织《鹰社》，出街头墙报《蒺藜》，编辑《陕北民歌选》等等活动，都有许多文学诗歌后辈被你所吸引，如同香甜的蜜被群蜂围绕着。老诗人萧三满意地说：“公木是你们中一位成熟的老大哥呵！”后来的几十年，你作得更多更好了，你负责主持作家协会的“文学讲习所”的几年，培养了不少成名的作家、诗人。真是“浇汗培桃李，桃李满园新”。这方面，东北的同志，吉林大学的同志，比我了解更多、更深。

我，就是你的一名诗弟。我成为一个爱好写诗的人，与你的鼓励、滋润是分不开的。1939年冬，你在我的极为幼稚的手抄本的诗集封面上，写下几个大字：“战斗的歌，尽情地唱！”后来的年代，你又不断给我“浇水、上肥”。遗憾的是，我这棵小桃李，长得太慢了呵，太慢了呵！公木同志还不止精神上帮助人，物质上也常常是自己刻苦，为别人考

虑的多。旧窑洞自己先住，新军装别人先分。我想起那双厚厚的棉布鞋来。1939年10月在山上秋收时，他看到我的脚被刺出血，就把他脚上那双在延安几乎见不到的自己家人给做得很厚的棉鞋，脱下来给我穿上了。我现在还记得那双新棉鞋多么暖和。那时我的脚正流血，穿着这双鞋，说不出话来。我忍着眼泪，看着他自己穿着草鞋。战友之情，火一样燃烧。我曾经写过一篇特写《我们胜利了》，想不到他们找我延安时的诗，还找出了这篇特写，发表在1939年12月的《新中华报》上。就是这个时候，写我们在山上劳动。身背黄挎包的老张来了（我们那时叫他老张）。“老张来了！”大家高兴地喊着，并将活停下来，听他给我们讲时事。他满头大汗，报告苏联红军出兵进入乌克兰西部罗夫城，城里的人民群众高呼：“乌拉！”出来欢迎红军。我们一天的劳动也胜利了，一片谷子都割完了，要收工回家了。每个人都坐在金黄色的谷堆上，听老张的报告，听完了就“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地欢呼起来。好象我们中国八路军在荒山上劳动，与苏联红军在辽远的战场上的胜利联成了一片！于是我就写下《我们胜利了》，也写了老张。这篇特写，作为“抗大一日”的代表作，被选上参加陕甘宁边区报告特写优秀作品展览。

公木同志，我尊敬的诗兄呵，你说：“世界本来大，天地蓦然宽”。你还在延安，就心胸开阔，面向世界，展望未来。把山沟沟与地球相联，把中苏、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接通。你那时就写了不少国际题材的诗作。可能有十几首之多吧！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很突出的，在中国整个诗坛恐怕也不多吧？如象你写的《万纳太太》那样新颖别致又深含幽默感的诗，是颇有特色的。在延安文化沟时，你还从英文翻译

了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我坐着去观望》等诗。我去年访美期间，向那里的同行们提到这件事情，使他们很感惊讶、钦佩。他们没想到，在艰苦战争年代的荒山沟里，中国共产党的诗人竟会想起美国诗人来，翻译他的诗，在诗刊上发表。

后来几十年里，你写国际题材的诗也没有断。除了写日本的那些精美的韵律体诗和写罗马尼亚的游记诗之外，还写了不少关于匈牙利的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特别是一首正面描写匈牙利事件的长诗，情绪激昂，含意深沉，诗境开阔。虽因形势变化未发表，但仍值得读，值得研究。因为它是历史的记录，是时代的诗声。

公木，我尊敬的诗兄哟！你对党的事业，对革命的理想，抱着坚定的信念，使我深受感动。你悼念一位战友说：

“扪心无疚悔，瞑目无怨尤。襟怀未尝舒，信念未尝丢。”你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奋战，也同样是勤耕钻研，不管委屈、冤屈，不顾风风雨雨，总是守在党交给的、人民交给的岗位上，总是抱定一个老战士的责任感，来要求自己。你在延安就明确支持、宣传、实行“首先是共产党人，然后是诗人”的号召，后来提的是“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或“做诗人，要先做战士”。做为一个党员、革命战士，这是党性、自觉性的表现。只是不幸，过去这种提法被严重误解或歪曲了。但这和有的同志忘掉了这个，甚至反对提这个，是不同的，至于个别人敌视这样提，则完全是两回事。革命精神、党性，是不会“老”，不会过时的。是的，要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始终维护原则，坚定信念，又要在新形势下勇于开拓、探索、发展，跟生活、跟人民一同前进，特别是当种种思潮泛滥，风浪四起的关头，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不是每个写诗人、评诗人能做到